

越南的政治經濟改革及其對中國的啓示

● 鄒 剛

一 引言

越南與中國不僅在政治、經濟上同是屬於社會主義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而且近年來先後發動了內容相似的改革。中國以「雙軌制」為特徵的全面經濟改革，在經過了一段「黃金時期」之後很快地進入了「相持階段」。計劃與市場價格並存，一方面搞活了城鄉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資源配置和產品供需；另一方面，雙軌制產生的外部經濟問題，被廣泛認為是形成貪污、腐化和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的中國當局，也因為害怕通貨膨脹失控，而遲遲不敢進行全面價格改革。中國對與價格密切相關的利率、匯率更是嚴加管制。經濟改革步履艱難。

越南的經濟改革起步較晚，以中國為榜樣的越南改革很快地也進入了一場比中國更嚴重的經濟危機。可是1988年底，越南一反中國雙軌制模式而行之，大膽地發動了價格、利率和匯率三大經

濟參量的市場化全面改革，取得了出人意外的效果。本文在簡略回顧越南經濟改革的起因和背景後，重點揭示1988年底和1989年上半年越南加速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並展望這一變革對中國的啟示。

二 改革的起因與背景

1986年12月中旬，越南共產黨在河內召開了越共中央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形成了關於展開全面經濟改革（doi moi——直譯為革新）的越共中央委員會歷史性決議。決議的內容非常類似中共1984年10月特別黨代表大會的公報。除了黨政分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未涉及之外，中共1984年全面改革公報中所有內容，以及中共關於農業改革三個一號文件內容，在越共1986年決議中均有體現。越共經濟改革決議包括中止南方的集體化運動，已集體化土地酌情退還給原有農民，在農村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讓農民得到超產後40%的利潤，發展多種經濟成分，鼓勵

· 本文編譯自筆者同名英文備忘錄。在英文備忘錄寫作過程中，筆者得到了世界銀行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並得到了Ange Tran越語幫助，高峰和徐滇慶最後閱讀和幫助修改了中文稿，特此表示感謝。文中觀點和錯誤概由筆者負責。

計劃外生產並允許計劃外產品按市價交易，實行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優惠吸引外資，等等^①。

在這次會議上，越共老一代主要領導人，因為「年齡與健康」的理由而被免去職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79歲的黨中央總書記與國家主席長征（Truong Chinh），80歲的總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以及76歲的政治局關鍵人物黎德壽（Le Duc Tho）。

被廣泛認為是改革派的阮文靈（Nguyen Van Linh）接任黨總書記。他在胡志明市任書記期間，就以推行經濟分權化而著名。黨代會後，越共書記處成為主要決策和執行機構。在13名書記處書記中，僅有三名是第六次黨代會前留任的。54名中央委員被解職。在第六次越共黨代會的前後，越南政府的22名部長中，被撤換了17名^②。越共在大幅度調整領導層時，並沒有像中共一樣建立顧問委員會。第六次黨代會常常被認為奠定了越南經濟改革的組織基礎。

和中國相似，越南農業改革正好遇上了1987年的好氣候，在多種因素影響下，大米產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最引人注目的結果是城鄉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農村取消了對僱工人數的限制，專業戶開始出現，城市則走得更遠。越南總理杜梅（Do Muoi）將新出現的經濟成分定義為非政府經濟成分。其中包括公私合營、聯營、集體、個體與家庭經濟。到1988年8月底，越南已有200萬職工在這類經濟實體中工作，佔地方產值的60%和全國產值的40%^③。大部分非政府經濟實體的產品進行市價交易，形成了和中國類似的雙軌制現象。一些虧損的小國營企業被「出售」給個體戶。走得最遠的是私人銀行：越南國家銀行不但允許少數私人銀行的存在，還允許這些銀行自定存貸利息。總之，越南效仿中國的改革，形成了和中國類似的經濟多元化局面。

但是，經濟改革對越共的挑戰比中共遇到的困難要嚴峻得多。據法新社報

導，越南的三位數通貨膨脹不但沒有被遏止，反而從1986年的700%通貨膨脹率上升為1987年的1000%。高達四位數的通貨膨脹使國民經濟瀕於崩潰^④，在嚴密控制下的越共政權也常常可發現貪污腐化。改革似乎加劇了越南經濟危機的到來。

三 加速改革及其效果

1988年底，危機下的越南進行了一場「悄悄的革命」。但越南決策透明度比中國更低，從越共公開發表的資料來看，很難判斷這場加速改革的直接原因。除官方匯率的變動有例行的公佈外，重大的改革措施並沒有廣泛宣傳，以至外界一時幾乎沒有覺察到這場「悄悄的革命」的來臨。

在這加速改革的前夕，一場自發的「院外活動」顯然形成了壓力。一百名屬於胡志明市「老戰士俱樂部」的成員，於1988年6月聯名寫信給越共中央，要求包括政治改革在內的更大幅度的改革。簽名者包括越南黨內極有影響的前駐中國和蘇聯大使阮康（Nguyen Khang）、阮文壯（Nguyen Van Tran），前副總理與交通部部長何輝甲（Ha Huy Giap）、潘重歲（Phan Trong Tuc）等等^④。他們要求國民議會實行真正的自由秘密選舉。俱樂部的干預雖然沒有成功，卻迫使越共當局開始了解經濟危機的社會、政治後果^④。

退回到改革前的計劃經濟在越共領導人看來也是一條絕路，1986年以前雖然沒有如此嚴重的通貨膨脹，但物資貧乏，特別是北方一些省份發生嚴重的饑荒。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1987年後改革「相持階段」警告了越共領導人。越南社會科學協會和越中友協1988年7月20日在河內召開了題為「中國經濟改革：成就與問題」的學術會議。會議綜述認為中國經濟改革一方面保持和加強了社

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另一方面造成了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

面對四位數的通貨膨脹而進退兩難的越共當局，只剩下加速大幅度改革的唯一出路。這場加速改革是實行以價格改革為先導的一系列經濟參量市場化。1988年8月23日越南總理杜梅發表包括放開價格在內的長篇重要報告。這篇報告顯然是代表越共政治局的意見。全文一再重申報告是對越共政治局《關於非政府經濟成分政策與管理體制的決議》的解釋。按照報告解釋，非政府經濟成分企業經營方式及產供銷完全自主。甚至包括自選開戶銀行和管理部門。非政府經濟成分企業所有產品按市價交易。政府經濟成分企業可以按議價（agreed price）與非政府經濟成分企業自由從事原材料、生產設備等交易。1988年8月28日越南通訊電訊稿報道，越南總理杜梅在一個不詳地點的講話中提出「僵硬的價格政策將轉換為實際上完全自由的價格政策。」^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989年3月訪越專家代表團被告知，除電力、運輸、郵政和燃料外，越南的所有物價（包括大米在內）已經市場化。不但非政府經濟成分企業完全進入市場化競爭，政府企業之間的交易也全部置於協議價之下^④。

放開價格的效果是很難準確地估計的，因為越南官方公佈的通貨膨脹率近幾年內保持在10%左右。法新社估計通貨膨脹率從1987年的四位數降低到1988年全年的三位數^⑤。渥德（A. Wood）在一份報告上估計的數字是：1989年第一季度為125%，4月為50%，5月以後河內幾乎看不出有通貨膨脹^⑥。一位越南國家銀行高級職員透露的數字是88年月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0%，89年已降為3%以下^⑦。儘管各種來源的數字相差如此之大，但所有數字的趨向是一致的，即全面放開價格的措施制止而不是加劇了通貨膨脹。

由於越南政府必須定期公布官方匯

率，外匯管理的改革較為透明。越南的匯率改革是從1987年底開始的。1987年12月1日，政府宣佈越南貨幣貶值78%，即從當時的80盾一美元貶為368盾一美元。這項措施幾乎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因為當時越南的黑市匯率為3000盾一美元左右。同期越南國家銀行開始投放面值1000、2000和5000盾新大額越鈔。越南的貨幣貶值，形成了與中國類似的匯率追逐通貨膨脹率的現象。貶值後的黑市匯率上升為4100盾一美元左右。1988年11月黑市匯率已經達到4600盾一美元左右^⑧。

越南國務院1988年10月21日頒佈了極其大膽的新外匯管理規定。這項規定不但允許企業、甚至允許公民以競爭價格向銀行買賣外匯。企業和公民可以開設外匯帳戶，並利用外匯帳戶從事轉借交易。1988年10月20日，胡志明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貿易與服務法案。法案實際上允許該市國營、合營，甚至任何18歲以上公民組織貿易行業方面的公司。市人民代表大會將認真的個別審議和簽發這類公司和個體戶的對外貿易權^⑨。

1988年11月17日，越南貨幣大幅度貶值。從368盾一美元貶為2600盾一美元（越南國際廣播台公佈的數字為2800盾一美元）。1988年12月26日，越南中央銀行宣佈越幣進一步貶為3000盾一美元。當時的黑市匯率實際已升值為4450盾左右一美元^⑩。1989年上半年通貨膨脹率的下降和貨幣的繼續貶值，使越南在半年多一點的時間內，達到了官方匯率向黑市匯率看齊的目標。由於越南的外貿基本上是與蘇東國家進行的，官方匯率大幅度貶值對這種援助性貿易為主的越南國際收支平衡沒有發生很大影響。貶值更直接作用在於遏止通貨膨脹，促進價格改革。由於越南領導人將價格改革的最終目標定為市場價向國際價格看齊，合理的匯率顯然是邁向這一目標的第一步。

匯率貶值對越南的國際收支產生了正面的影響。越南100萬海外僑民（新

難民僑民)開始增加向國內親友的匯款和贈物。據法新社電訊,1989年上半年這項目總值達到三億美金,幾乎等於1988年全年數字。另一個迹象是中越邊境的非官方實物貿易大幅度增加。世界銀行代表團成員在河內驚訝地發現,個體商貨攤上充斥中國邊境走私的消費品。據稱這些商品是由於貨幣貶值後,用大米等與中國換貨而來。因為越南的大米價格在中國雲南、廣西等省競爭力大大提高。越南領導人甚至開始擔心中國的便宜消費品對越南自身工業的打擊。

越南貨幣政策在1988年最後一個季度也有很大變化。越南國家銀行決心將幾年來的負利率,在很短時間內轉換為正利率。宣佈了國家銀行平均利率計算公式為利率必須高於通貨膨脹率一個百分點。越南國家銀行官員透露的數字為1989年中,存款利率高於1%,低於3%^⑦。渥德報告中儘管沒有給出任何具體數字,但他估計通貨膨脹率和利率都會遠高於官方數字。這份報告認為實際利率會大大高於1%^⑧。一方面,政府允許專業銀行、儲蓄合作社和私人銀行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利息來競爭吸收存款。對國營企業的貸款利率也取消了任何補償。另一方面,政府決心控制貨幣發行。財政部決心將1988年度政府支出佔32.4%的赤字降為28%^⑨。這意味著政府減少向銀行的透支。在提高利率的同時國家銀行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⑩。

據河內一位資深經濟學家估計,貨幣政策的改革,使越南的各類銀行在短的時間內動員出70,000億盾的資金(一億七千萬美元)^⑪。存款上升和貸款利率的上調,有效地配合了價格市場化的改革。另一方面,強硬的貨幣政策也帶來了一些可以預料到的麻煩。越南全國總工會主席阮文修(Nguyen Van Tu)透露,1989年上半年,多達50萬國營企業工人閒置。這段時間未付的工資多達10億盾^⑫。副總理阮基石(Nguyen

Co Thach)承認最好的企業在越南也有一個月的工資未發,最差的企業則長達六個月發不出工資。流動基金極為短缺,很多企業瀕臨破產^⑬。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河內市委書記范世閱(Pham The Duyet)承認在該市300家市屬國營企業當中,90家很難發出工資。該市也關閉或轉售5%左右的這類工廠給合營或私營企業。官方經濟學家認為10-15%的國營工業將關閉或轉售給合營或私營企業^⑭。儘管緊縮貨幣的困難使貨幣政策改革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非議,河內自由派經濟學家(如石某Thach)引用弗里德曼的觀點,認為這些副作用是為遏止通貨膨脹不可避免付出的代價^⑮。

越南的經濟加速改革在政治上也自然形成了一個寬鬆的環境。在1988年底越南召開的八屆四次國會會議上,經濟改革成了壓倒一切的主題。代表開始大膽地批判政府的經濟政策,政府主要官員受到嚴厲的質詢。會議氣氛類似於1986年中國人大委員會會議。代表們要求更廣泛的改革,其中包括勞動制度、工資制度以及補貼政策等^⑯。這次會議顯然對1989年3月越南進一步加速改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段時間越南加速改革的重要特徵是加速各種為改革服務的法規制定。截止到1989年上半年,越南的重要經濟管理領域已置於新政策法規之下。政府頒佈的法規包括企業自主權、物資分配與交易、外匯管理、經濟特區、投資管理等等^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麥克·康德沙斯(Michel Camdessus)1989年7月訪問越南時發現,越南領導人已經單方面進行了該組織希望越南從事的經濟調整計劃。IMF和世界銀行的專家均認為向越南恢復貸款的條件從經濟上看已經成熟。政治上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也造成了良好的氣氛。但是在1989年9月13日IMF和世界銀行年會上,美國和日本從政治考慮,阻止了恢復貸款。因為他們希望對越南保持壓力,以促成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

四 越南改革的問題

判斷越南經濟改革的問題和判斷其改革成就一樣的困難。這是因為越南經濟信息的公開性遠遠落後於越南的經濟改革。越南是唯一沒有列入IMF統計日報的這個基金組織的成員國。越南領導人講話中很少引用數字。除定期公佈農業生產、計劃目標和預算總數外，外界很難看到越南的各種詳細統計數據。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數據是否存在也是問題。特別是越南巨大的軍費開銷和蘇聯、東歐國家的援助，增大了統計工作的公開性和統計工作本身的困難^①，因此下面只能定性地討論問題。

第一，越南經濟仍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體制與市場化的矛盾仍是一個未解釋清楚的問題。越南沒有清楚地向外界說明公有企業是如何進入市場競爭的。《遠東經濟評論》上報道的IMF、世界銀行和UNDP報告，實際上留下了很大疑點。例如外界報道中幾乎沒有工資改革的資料，沒有相配套的工資改革，越南是如何進行以及是否可能進行全面價格改革？許多問題有待於掌握資料後進一步研究。

第二，越南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中國50年代的情況。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的援助形成了越南工業的主體。蘇聯已幫助越南建設了250個大項目。在當前1986-1990五年計劃中，蘇聯將援建100個新項目，比上個五年計劃增加一倍。隨着蘇聯援建的工業成為越南經濟的主體以後，斯大林式的經濟管理制度顯然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一定程度上，越南過去計劃經濟和國有工業的不發達，減少了經濟改革的阻力。但以國有制為特徵的蘇聯援建工業，似乎正在從客觀上加強計劃經濟的力量，走向改革的反面。

第三，中國在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很多其他問題，越南的改革一定也會碰

到。但目前尚無任何資料進行研究。例如黨政分離問題，從市級以上領導看，越南顯然是黨的第一把手主管一切，包括經濟問題。企業一級的決策機構則極不清楚。又如收入分配問題，越南是否出現像中國一樣的級差拉大？分化到甚麼程度？在1988年底人大會上，有的代表提出徵收個人所得稅問題。如果存在收入分化現象，社會對此的承受程度，也是進一步值得了解和研究的問題。

五 越南經濟改革的啓示

越南近兩三年的改革，無疑對其他正在或將要經歷改革困難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啓示。柬埔寨近年來的經濟改革幾乎是步越南的後塵而行，也取得了良好效果。正在準備全面改革的蘇聯，十分重視越南的經驗。最近蘇聯設計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時，並不打算走中國發行外匯券的做法，而是一開始就希望形成可自由兌換盧布。在最初的實驗貿易中，盧布竟貶值十倍以上。儘管今後動向並不明瞭，蘇聯當局的決心卻令人印象深刻^②。

非常遺憾的是筆者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查不到任何研究越南改革的中文資料。如果說中國一再企圖建立自己的改革試驗區的話，她卻忽略了一個沒有成本的天然試驗區。如果有人認為蘇聯過去默許匈牙利經濟改革是為自身改革提供經驗的話，那麼不經中國的默許，越南似乎正在為中國的改革尋找出路。

據一專家估計，越南改革前主要產品黑市價與官方價相差在十倍以上^③，這些問題比中國改革「相持階段」的情況險峻得多，但是越南的加速改革再次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奇迹般的作用。而中國的猶豫不決導致改革更為艱難。

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筆者對越南今後的改革並不樂觀。但是，僅就越南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上半年的加速改革來研究，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史上

一個不可多得的歷史經驗。當中國重新啟動時，她首要的任務，是向比自己貧窮得多的鄰國，學習這段豐富的改革經驗。

註釋

- ① Fforde, A. and de Vylder, S., *Vietnam—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Stockholm,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1988.
- ②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 *Asia 1988 Yearbook* and *Asia 1989 Yearbook*, Hong Kong, Review Publishing Co., 1988 & 1989, pp. 252-56.
- ③ Foreign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FBIS-EAS*, 6, 30 June, 25, 27 July, 30 August, 27, 28 September, 24, 26 October, 17, 30 November, 20, 21, 27, 30 December 1988; and 13, 17 January, 24 February, 19, 25, 27, 30 March, 17, 21 April, 30 May, 12, 19 June, 22, 27 July, 29 August, 30 September 1989.

- ④ Chanda, N., *Force for Change*, FEER, 5 October 1989, pp. 24-26.
- ⑤ Awanohara, S., *Fiscal Interdiction*, FEER, 28 September 1989, pp. 22-23.
- ⑥ Wood, A., *Deceleration on Inflation with Acceleration of Price Reform: Vietnam's Remarkable Recent Experience*, memo, University of Sussex, 12 July 1989.
- ⑦ Herbert, M., *On Hanoi's Doorstep*, FEER, 26 October 1989, pp. 106-107.
- ⑧ Chanda, N., *Consumer Crisis*, FEER, 7 September 1989, pp. 86-87.
- ⑨ Zou, G., *Political Economy of Vietnam's Reform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China and Other CPEs*, memo,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30 September 1989.

鄒剛 現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系唸博士課程，兼任南加州大學 IBEAR Program 客座研究員和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客座主編。